

TEMASEK HOLDINGS

本演讲词以英文编写，并翻译成简体中文，如有任何差异，应以原英文版本为准。

2005年5月14日
史丹福校友会新加坡分会
20周年聚餐晚宴及优异成绩奖学金颁奖典礼

2005年5月14日，星期六，下午6时30分，香格里拉大酒店

史丹福校友会会长Tay Choon Chong先生，
贵宾们、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

首先，容许我带领各位回到15年前，也就是1989年。

一个寒冬的晚上，在其中一个中国沿海城市的某餐馆内。某家公司的执行总裁与一位刚从研究院毕业的年轻工程师刚刚结束了3个小时的聚餐和面谈。那位年轻的工程师，稳重、能干，其学识和能力都非常符合总裁的要求。可是，无论总裁如何极力游说，他都没有办法说服那位年轻的工程师接受极具吸引力的聘约，离开中国到他的机构去开设全新的实验设施。

总裁靠着椅背，凝神注视挂在天花板上的红灯笼。他回想起数个月前，他的其中一位研究部职员前来找他。那位焦虑的职员提出请求，恳请总裁帮助他的朋友离开中国。他说，他的朋友拥有公司所需要的技术，而这位朋友也与他一样，毕业于同一所海外大学，只不过在1989年初，也就是6月4日之前的数个月，这位朋友选择返回中国。当时，总裁心想：好呀，有何不可？反正他真的非常需要该方面的专业人才，去开设全新的设施，也就不妨与这个人见一见面。于是，在一个寒冬的晚上，这位总裁就来到了中国一家毫不起眼的小餐馆里，与那位举止稳重、理念清晰的年轻人对上了话。

年轻人非常感谢总裁所提出的丰厚待遇，但他说他不能离开中国，因为中国需要他。如果他不留下来，谁还会呢？假使像他一样的人都选择离开，中国的将来会变成怎样？

在六四事件之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逃离中国，或者选择不再回国。他们惧怕中国会重新封关锁国，堵住现代化之路。然而，同时也有千千万万的人，像这位15年前的年轻人一样，选择留下来。在连续几代拥有胆识、理性判断和才能的领袖的带领下，这些精明能干、训练有素和忠心的专业人士，为中国带来了新希望、新机遇，以及新的远景。

今天，全世界继续聚焦中国，观望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发展，赞叹中国的变迁。自1989年的那个寒冬的晚上，中国与全世界都已经改变了。

有趣的是，新加坡也曾经经历过重重困阻，才能开辟出自己的道路，迈向改革和发展。自25年前开始，一群充满理想的年青男女，全力投入去创造一个自由民主，以正义

和平等为基础，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的精英管理社会。他们不希望成为殖民地居民，也不愿意成为二等公民。在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只是40多岁，而他们的领导人也是一位30多岁的男子。数以千计的人，包括出生于新加坡和国外的人士，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一起作出承诺，每人尽己所能，去为自己建设一个美好的家园和未来，整合多个宗族、部落和种族，共创一个和谐的国家。正如那位年轻的中国工程师一样，他们其实也可以倚靠自己的技术与才能移居外地。但是，他们选择留在这一块荒芜之地，一起创造奇迹，让她成为世界地图上闪出亮光的一个小红点。

新加坡的蜕变所倚靠的其中一份推动力，就是她对于社会基础建设的投资。对一个国家来说，社会基础建设就像一块公用草地。在古老的英国，每位畜牧者都可以随意把羊群带到公用草地放牧。因此，每位畜牧者都希望让最多的羊只在公用草地上放牧。当越来越多人这样做，公用草地很快就变得贫瘠，四下荒芜。除非每个人都互相合作，同意遵守共同规范，让放牧维持在可持续的水平，否则公用资源就会耗尽，让所有人都遭受损失。要在自由市场贯彻执行这种对所有人长期有利的措施，常常显得非常艰难。由于市场讯息是即时和短暂的，因此为了广大群众的更长远利益，必须有一个受承认和有良好的管治能力的权力机构，去发挥供给、培养、规管和仲裁的作用。这些就是政府要做的事——为了照顾全民的长远共同利益，而作出良好的管治。

新加坡是一个社会民主国家，一直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创造和提供稳健的社会基础建设。至于经济建设的其他部分，她都留给自由市场主宰。然而，新加坡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所不同，新加坡相信的管理法则，是根据个人选择和个人自身责任的价格机制和市场规律，去提供可持续的社会基础建设。利用社会利益去包装服务的国有化，肯定会招致失败，而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早已屡见不鲜。

教育、公共房屋、退休储蓄计划、国防保安，以及基本建设和服务，都是新加坡社会基础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些组件中，教育是强而有力的发动机，它可以收窄贫富收入的差距，促使社会群体的流动性，并且让每一代人都能冀望下一代能获得更美好舒适的生活。

可是，新加坡并不是完美的，她还是一个有待磨练、力求进步的社会和国家。我们仍然处于不断转变的进程中。

举例来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结构性失业，反映出现时与早年我们在独立期间所拥有的教育机会的差别。目前，大约有一半50岁以上的新加坡人只拥有低于中二的学历，而家境贫穷是构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相反地，在40岁以下的新加坡人，则有超过60%拥有大学学位。自1960年代后期开始，新加坡在教育上作出密集式的投资，除了在短时间内大量兴建学校和培训教学人才，学校更设有上午和下午班，以充分利用有限的教学资源，而这群比较年青的人就是这段时期的受益人。与我年纪相当的一代，以及那些比我们年长但错失受教育机会的人，将会在未来20至30年与我们一起生活于未来的环境里。他们的下一代，也就是年龄在40岁以下的子女，都拥有比较美好的发展前景，也就更有能力供养父母，但那些没有家人的上一代，无疑是我们社会需要特别关注的一群。

另一项公共利益一家居购置计划，其创立原因是为了让一个移民社会得以植根。大规模的公共房屋建设计划非常成功，也成为了国家的一种财产。随着经济成长，大部分公民都从资本增值中享受到资产提升。被留在后头的可能就只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5%人士，他们不够财力购买房屋，而只能继续住在公共租用房子里。他们也就是难以负担子女的读书费用的一群，家庭成员数目众多，也往往加深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让他们的子女接受教育，以及让他们不断接受培训，是帮助他们脱离贫穷线的方法之一，也有助于防止这一部分的人长久停留在社会的底层。

整体来说，新加坡在过去40年相对来说是幸运的。我们的社会能够把握战后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波进程，支持自己的生活和存在。这使我们能够顺应趋势，成功把国家工业化，进而提供足够收入去资助我们实现所有，无论是房屋、教育和卫生保健，还是公共道路、动物园、公共游泳池和国防保安等。

然而，随后而来的20至30年，全球化的下一波将会是相当不同的。二十亿生活在中国和印度的人已经快速加入了全球的劳动市场，亚洲已经释放出庞大的动力和机遇，但是，那些少受教育、培训不足或缺乏领导的人，也同样蒙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威胁。

作为一个社会，这对新加坡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高层就业方面，顶级的律师和银行家都被全球性的劳工价格吸引而离开。另一方面，低技术性劳工则受到10至20亿个渴望工作、精力充沛，以及较为机灵的劳工的压抑。我们国家的庞大中产阶级也需要因时制宜，视乎劳动力的流向以及知识价值，在某一特定时间调整就业形态。

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稳重的年轻工程师与公用草地的话题。假如年轻的工程师和与他同时代出生的人没有作出个人承诺而留下来，帮助建立中国，中国就不会成为今天的中国。假如当时的领袖如邓小平和他的几位继承者，不是那么充满智慧和力量，为国家的发展大方向作出理性明确的决定，以及在旧思维与旧政策被证实为错误和失效时，立刻作出果敢和不可预见的改革，中国就不会成为今天的中国。

在发展中国上千个城市的过程中，其背后的故事与新加坡在建国初期的经历同样丰富，同样难得。

新加坡在未来所需要面对的挑战，也就是现时她的领导者和年青人所需要面对的集体挑战。如果缺少了充满热诚与能力的领袖们为大众服务，不畏惧、不偏私、不顾个人得失地为国家作出清晰理性的决定，实现大胆的改革，新加坡在未来20年就会成为历史，失去领先的地位。如果没有年青人，尤其是那些训练有素、才能出众又精明能干的专业人士，都不愿去承担义务，不愿全心全意地为新加坡的将来奋斗，那么新加坡的地位也将会倒退，落在亚洲各国之后。今晚，在座的我们都是从那一片平等、自由的公用草地中获得肥沃青草孕育的受益者。我们很幸运，能够享受到教育带给我们的财富。

假如我们认为，自己能够完成学业，成功毕业并获颁学位，然后得到美好生活，这都是个人自身的功劳，那我们确实是忽略了其他人为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创造机会而所作出的奉献。那我们就像是那些在公用草地上过分放牧的畜牧者。如果大部分人都只想从制度中取得最大利益，不论是教育或个人所需，或我们缺乏承担，不愿为他人和我们的后代去维持一块可持续发展的公用草地，那些青草就无法持续生长，而草地也很快就会变得一片荒芜。我们各人最后在精神和财富上都会变得贫乏。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将来，无论是集体的或个人的，都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当前的世界虽然时有困扰，但还是前所未有的美好。我们因而得到平稳的发展，我们从中得益，也对整个世界的进步作出贡献。无论是否拥有特定的头衔或职位，不分地位高低或财富多寡，我们都可以选择贡献自己的力量，或多或少，为我们自己、同胞和后代，去不断灌溉我们这一片共同的土地。

[你可能会问，那位年轻的工程师现在过得如何？他现在是中国其中一家大型企业的执行总裁，对于只有40来岁的人来说，事业办得相当成功。他继续灌溉那块共用草地，目前也是那位向他提出聘约的总裁的好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灌溉自己的园地，必定会获得回报。]

在我结束之前，我希望引用一段常用的爱尔兰祝福语作为总结，也把它献给在场的各位： 在开展人生的不同阶段，在生活、学习、选择和改变的旅途上，

愿无限坦途任驰骋
愿和风抚背助你行
愿阳光沐浴脸庞温暖你
愿雨水滴落滋润你的土地

[并祝愿：您的倾心付出，换得满园锦绣]